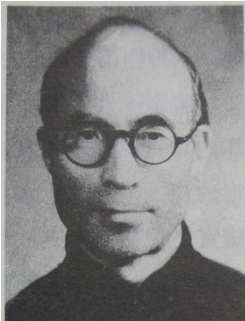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四大名旦”相聚华西坝（四）

金开泰

吴宓 1944 年被核准休假，收到梅贻宝的快函邀请到燕大开“世界文学史大纲”及“文学与人生”，又收到川大黄季陆之邀，开“欧洲文学史”与“英国浪漫诗人”两课，遂决定到成都“与寅恪、公权共事共学。”成了“燕大四大名旦”之一。

吴雨僧在成都



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吴宓

吴宓字雨僧，陕西泾阳人，1894年8月20日生。本名吴玉衡，取自《书经》“陈璇玑之玉衡”之义，是北斗七星之一。1901年，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为吴陀曼。吴宓之名是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由自己所取。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《康熙字典》，闭目确指，得一“宓”字，意为安静。“雨僧”多认为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《虞美人·听雨》：“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”一句。

1907 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，受关学熏陶，与于右任、张季鸾同为“关学”余脉。1911 考入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。1917 年到美国留学，先攻读新闻学，1918 年改读西洋文学。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，获文学学士学位。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，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，研习比较文学、英国文学和哲学，为白的高足。与陈寅恪、汤用彤并称为“哈佛三杰”。他对陈寅恪先生十分敬重。曾称：“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识得陈寅恪。当时即惊其博学，而服其卓识，驰忆国内诸友谓：‘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，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……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’”。

1921 年回国，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（南京大学）文学院任教授，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，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，基督教文化、印度佛学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，开设“中西诗之比较”等课，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。并与梅光迪、柳诒徵一起主编于 1922 年创办之《学衡》杂志，11 年间共出版 79 期，采古典主义，抨击新体自由诗，确有守旧之处，但主张维持中国

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。1924年赴沈阳，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。次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，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、王国维、赵元任及初上讲坛的陈寅恪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，为我国学术界立下了第一功劳，一时号称得人。国学院五年中为中国文史之学培养了数十位卓有贡献的知名学者。他识人举荐之力及任主任之功，是中国学术界不可忘的。

1928年，吴宓兼任天津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主编，他编古典文学，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。1930年，赴欧洲旅游，先后游历了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瑞士、德国等许多国家，访问了雪莱、司各特、卢梭等人的遗迹。次年结束游欧归国，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。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。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“博雅之士”。

他是《红楼梦》研究的名家，也是最早向西方介绍，并肯定其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之人。一生迷恋《红楼梦》，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小说，甚至是唯一的一部小说，但总是徘徊于大观园而不能自拔，甚至以妙玉自况，在现实生活中过得很苦。而纵观一生，他在动荡的年代，世事混乱之中，为中国文化不惜车裂以殉的精神，致死不改初衷的风骨和陈寅恪一样是中国学人的榜样。

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。1943-1944年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，1944年10月26日到成都燕京大学外语系任教，并在四川大学兼课，1945年9月改任外文系教授，1946年2月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，1949年4月底入蜀定居，任相辉学院外语教授，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，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，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，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(后到中文系)任教，终其一生。笔者1956年入西师历史系时，第一学期聆听他讲授世界古代史。当时他已60有过，身着一身长衫，足登布鞋。身体瘦削，精神饱满。讲课从头到尾，熟极而透。既无讲义，又无书本。特别是荷马史诗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，他尽可以大段大段地背出来。课休时同学到讲台上，只见讲台上只有一个旧信封，背面写了几句提纲。大家皆惊叹学问的渊博。助教王兴运老师坐在一排，不停地记。后来他的记录就印成讲义发给同学们。他的长衫后来又是同学们说相声常借的服装。可惜，当时年青，没有和他建立交情。

吴宓在“文革”中的遭遇催人泪下。“文革”发生时，吴宓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，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，在一次批斗中，吴宓被人从台上推下来，摔断了双腿，就此落下残疾。即使这样，他还要拖着残疾的双腿，扫厕所、刷

尿池、刮粪便，继续受到轮番的批斗，经常还要遭到断水断饭之折磨。1974年又因拒绝批孔，定为“现行反革命”受批斗。1977年1月由妹将双腿残疾，双目几近失明的吴宓接回老家泾阳县，1978年1月17日含冤去世，终年84岁。

吴宓（雨僧）曾两度执教燕京大学。一是30年代初在北平任教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时，在燕京大学兼课。他大概是燕大英文系第一位中国籍教师。他在系上开过翻译课，并为杨刚翻译的《傲慢与偏见》作序（商务印书馆出版）。这是那部文学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。

抗战胜利前后，他再次来到在成都复校的燕京大学。1943年8月，他接到由香港脱险归来，在广西大学教书的陈寅恪先生的来信说：“将携家赴成都，就燕京教授聘”，于是决定第二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休假，到燕京讲学，“与寅恪、公权共事共学”。公权是肖公权教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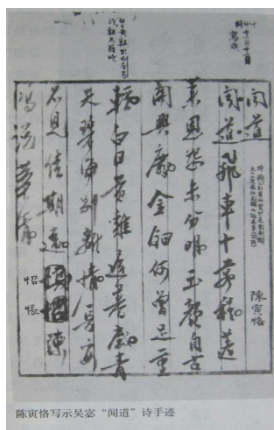
1944年10月21日到成都，11月2日在燕大授课，教授“世界文学史大纲”、“文学与人生”两门课。初来时暂住马鑑（季明）先生家，后来迁到文庙宿舍，与住在文庙的男生朝夕相处。除了正式上课，常有课外演讲。他自己就曾多次演讲“红楼梦”，还讲过“文学人生：如何读书，如何做人”，又应社会系学生之邀，讲人与人相处之道等等。他曾这样记述对成都燕京大学的印象：“燕大学生共四百人，三分之二为平津来者，悉操北京语，清脆悦耳”；“燕大校内，地域极小，然洗刷洁净，地无微尘。办公各组，均聚一楼，接洽甚便”；“始在燕大上课，学生热心听讲且整洁而有礼貌，宓甚喜之”；“宓颇羨燕京师生亲洽，作事敏密，及男女交际自然之风气，为他校所不及”等等。

到校不久就遇上燕京复校两周年纪念。同学早几天已忙于筹办纪念活动，又编写壁报等。他撰写了对联数幅表示祝贺。一联贴在燕大礼堂正中壁上：“众志成城天因地垒，一心问道铁扣珠门”。自注此联系“用赵紫宸先生诗意”。另两幅，分别贴在文庙男生宿舍二门和三门两侧：“复校兴邦事同一体 化民救世业始吾心”；“处变知常允文允武 先忧后乐成己成人”。1944年12月8日上午，全体师生在礼堂举行复校两周年纪念会演讲。午间，在文庙男生宿舍会餐，有女同学唱歌，梅贻宝校长说笑话，非常热闹。晚上，到女生食堂会餐。席间陈芳芝教授等为参加远征军的同学募捐，大家积极响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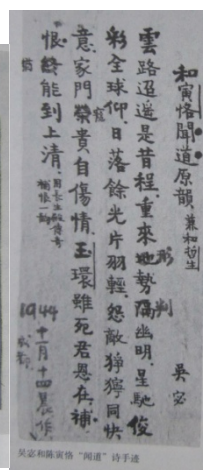
1945年暑假，讲学期满，准备返回西南联大，燕大同学开会欢送，赠物献花，非常热情，深受感动，曾赋诗二首：一：客座惭虚讲，将归黯别情。今宵

来盛会，多士见真诚。歌颂添余兴，嚶鸣求友声。师生融泄乐，吾早爱燕京。
二：赠物深深意，意浓物亦精。绿笺通远讯，红烛待天明。菊慕陶公洁，莲思周子清。束花当献佛，何殊桂冠荣。诗作原稿后面，记有参加欢送的二十一位燕京大学同学的姓名。不久，抗日战争胜利，原内迁各校纷纷准备复员，清华也将迁回北平，他没有再去昆明，而留在燕京继续任教一年。仍开两门课，及负责指导毕业生的论文。1946年暑假，燕大师生分批复员北上。每次有熟悉的朋友学生离蓉，他都前往头等着送行。

吴宓自1919年在美结识了陈寅恪后，两人虽性格不一，但对中国文化的执着与殉道却是相同的，因此两心相知，深挚友情，长达半个世纪，直到终生，始终不渝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。在成都燕大期间虽只一年，正是陈眼疾失明之时，吴对陈的关心令人称誉。吴到成都第二天立即到广益坝看望陈，久别重逢，叙晤欢畅。11



陈寅恪写示吴宓“闻道”诗手迹



吴宓和赠寅恪“闻道”诗手迹

月11日相互有和诗“闻道”。12月12日到陈家，知陈左目今晨不明。14日入院后，吴在上课之余几乎天天去探望，有时甚至一天两次。常久坐，陪谈、读报，录诗。在吴的日记中记述了陈治病的历程、情绪变化等细节。记录陈诗及和诗也不少，如12月17日陈口授诗，命吴录之，并送公权。12月21日谈红楼梦。2月24日吴回乡探亲回成都后，又立即到家探访。其后还准备送陈到昆明，转赴英治疗，可惜因患急性胸疽未能如愿。这的确是当代学人相交、相知、切磋的典范，也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篇章。

唐振常先生在“漫忆肖公权先生”一文中说：四先生都已去了，寅恪、雨僧二先生守道以终，晚景令人欲哭无泪。方桂、公权二先生均在美获令誉，登寿考，方桂先生为全美语言学会会长多年，学术声望之高，与同辈赵元任先生相伯仲。一时四大师，晚年境遇之不同，有若是者！

参见燕京大学人物志第一辑：吴学昭：吴宓及吴学昭《吴宓与陈寅恪》